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 中期文学研究

The Study of Kuizhangge Literati Group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of Yuan Dynasty

邱江宁 著



人民出版社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 中期文学研究

The Study of Kuizhangge Literati Group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of Yuan Dynasty

邱江宁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夏 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邱江宁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01-011728-7

I. ①奎… II. ①邱… III. ①文人-人物研究-中国-元代 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元代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7243 号

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

KUIZHANGGE WENREN QUNTI YU YUANDAI ZHONGQI WENXUE YANJIU

邱江宁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3

字数:4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728-7 定价:7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编

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艺理论主张与 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关系

第一章 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教育背景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关系	23
第一节 元代文艺界兴起复古思潮的社会大背景	24
第二节 奎章阁文人群体的艺术造诣与赵孟頫及其复古思想的关系	36
第三节 奎章阁文人群体的经学教育背景与复古思潮的关系	49
第二章 奎章阁文人群体的诗文复古思想及实践	59
第一节 虞集的诗文复古理论宗旨及创作实践	60
第二节 奎章阁文人群体在诗歌方面的复古理论主张与实践	76
第三节 奎章阁文人群体在散文方面的复古理论与实践	89
第三章 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	106
第一节 叙事纪实的特征	106
第二节 意象明晰的特征	116
第三节 情感平和的特征	127

第四节 “北人作南风”的创作特征	292
第九章 元代中期文坛的“南人作北风”现象	316
第一节 南人北上热情与元代中叶南方文人的“两都”书写	317
第二节 元代中叶上京纪行诗的出现及繁荣	340
第三节 南方馆阁文人与上京纪行诗中“南人作北风”的创作 内容	351
第四节 上京纪行诗中“南人作北风”的诗史意义	367
结 语 奎章阁文人群体对元代中期文学的影响	374
附 录	392
一、奎章阁学士院任职人员表	392
二、奎章阁文人核心成员群体表	396
三、奎章阁文人群体重要作家作品知见情况叙录	398
参考文献	493
索 引	512
后 记	519

绪 论

元代文学研究,元曲是显学。而元代实际创作情形并不如此。入元之后的南方文人对待元曲普遍有抵制情绪,他们绝不染指散曲创作,杂剧更不必说了,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元曲优秀作家诸如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活跃的时间是元代中叶(1279—1320),国家文治繁兴之际,元曲创作已陷入窘境和颓势,^①取而代之的是元代中叶的诗文中兴。20世纪20年代,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的总论中评价元代文化说:“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②通观《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垣所指的“文学”是指元代的诗文创作,陈垣的总结很有道理,但没有引起元代文学研究界的充分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元代诗文研究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这其中,邓绍基、杨镰、李修生、查洪德等先生对于元代诗文研究以及文献的整理贡献尤大。邓绍基的《元代文学史》,杨镰的《元诗史》、《元代文学编年史》,以及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查洪德的《20世纪辽金元文学研究》等著作,为元代诗文研究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另外,一些专题研究也给人启发甚大,像查洪德的《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黄仁生的《杨维桢与元末明初文学思潮》、杨光辉的《萨都剌生平及著作实证研究》等。但是直到2008年,李修生先生针对元代诗文研究的现状还是感慨地

^① 参见陆林:《元代戏剧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9、46页(本书所有注释,凡同一种书籍的注释,只在第一次注释完整,含作者、著作、出版机构及出版时间、页码,以后重复出现时,则只标注具体篇目、著作名称及页码)。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说:“长期以来,对元代文化、文学的评价,由于种种原因,却仍有歧义。元史研究一直是很有成绩的,关于元代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研究也有不少进展,但一些成果似也没有及时为文学学科吸纳。”^①的确,元史研究中,诸如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汇编》、《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以及元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对于元代诗文研究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但史学界的丰硕研究成果尚未被元代诗文研究充分吸收。综观元代诗文的总体发展脉络与创作格局,元代诗文发展、繁荣的真正主力军和推动者,主要是以馆阁文人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而在现有的元代诗文研究中,奎章阁文人群体还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而揆诸史实,奎章阁文人群体对于元代文学尤其是元代中期诗文鼎盛局面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这一块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目前,只有台湾姜一涵的《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对元代奎章阁做过官制的考察和文献的整理工作,而且全书关注的重点在于奎章阁作为一个书画鉴藏机构的意义,并没有涉及奎章阁文人群体在文坛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的重大影响。因此,元代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的研究是元代诗文研究深入展开必须面对、且必须仔细研讨的课题。

奎章阁是元代中叶天历年间元文宗创建用以收藏图书和古董器玩以供他与讲臣讨论、清玩的地方,它在建制上有些像宋真宗朝的龙图阁和宋仁宗朝的天章阁。但是与龙图阁、天章阁有着本质的区别,奎章阁又是奎章阁学士院的代称。宋代的龙图阁、天章阁是先建设有地方,然后再安排人事,它们在性质上是帝王的私人书房,并非什么组织或者文化机构。而奎章阁与奎章阁学士院的关系却是先有奎章阁学士院这一机构,然后再筹建奎章阁。而且奎章阁学士院筹建的初衷虽然带有帝王私人书房的性质,但实质是元文宗与其兄长元明宗争夺帝位过程中的尴尬产物。天历二年(1329)二月,让帝位于兄长元明宗的元文宗为打消元明宗对自己的猜疑,服从元明宗的旨意,组建奎章阁学士院,三月在西宫兴圣殿的西廊辟出三间作为奎章阁。随着形势的变化,天历二年(1329)八月,毒死兄长的元文宗再次即位。由

① 李修生:《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序》,见《戴表元集》卷首,李军、辛梦霞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于元文宗两次即位的成功都完全依靠武将燕铁木儿及其家族和心腹的力量,所以元文宗不得不为表达感激而赋予燕铁木儿家族甚至超越皇权的权力,“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①,全归燕铁木儿及其家族、亲信总裁和掌管。尽管如此,本身有一定政治抱负、且深受汉文化熏染的元文宗并不甘心政权统治完全为燕铁木儿等人把持,所以再次即位后的元文宗试图期望借助奎章阁学士院这一文化机构来使自己进入有序、有效的政治统治轨道。基于这样一种政治前提,奎章阁学士院在元文宗再次即位后被升格为正二品机构,下辖群玉内司、艺文监等机构,人员数量从最初的六名扩充到八十余名,并领修大型政书《皇元经世大典》,所以奎章阁学士院在元文宗时期扮演了极其重要、瞩目的角色,是元文宗时期相当重要的执政标志。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所给予的特殊期望以及赋予它的特殊地位,这个机构曾经聚集了当时元代文化界、政坛最重要的人物,也曾一度使元代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艺术收藏和鉴赏事业相当繁荣。元文宗死后,这个机构不再受重视,后至元六年(1340),奎章阁被改为宣文阁,职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从天历二年(1329)创建到至元六年(1340)被改换机构,奎章阁学士院虽然存在的时间不到12年,却在元代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是元代尤其是元代中期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绝不可忽略的对象。

由于元文宗对奎章阁学士院的政治用心,奎章阁学士院承担着为皇帝和贵族子弟讲说经史,赏鉴文书、典籍、字画、器物,并备皇帝咨询、研考古帝王治术的职责,所以“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出任奎章阁官。^②那些在奎章阁中担任职务的成员除了蒙古、色目人之外,拢聚了虞集、揭傒斯、宋本、李洄、康里巎巎、赵世延、忽都鲁都尔迷失、阿隣帖木儿、铁睦尔塔识、欧阳玄、苏天爵、许有壬、柯九思、杨瑀、王守诚、泰不华、阿荣、朵来、朵尔质班、沙剌班等一批绝对堪称元代南北一统后成长起来的最优秀的各族文

^① 宋濂:《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宋濂:《元史》第1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332页。

^② 参见揭傒斯:《送张都事序》,李修生等:《全元文》第28册,江苏凤凰传媒出版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80页。

人精英。由于他们的聚集,奎章阁时期也堪称元代规模最齐整的馆阁文人群体的黄金时期。这些奎章阁文人与元代至元、大德时期的文臣姚燧、阎复、不忽木、程钜夫、赵孟頫、吴澄、阿鲁浑萨理、阿鲁翬、畅师文等人或为子弟、或为门生、或堪堪相与同事;与延祐、至治、泰定时期的文臣李孟、张养浩、蒲道源、袁桷、贡奎、元明善、王士熙、曹伯启、邓文原、柳贯、杨载、范梈、王结、李术鲁拙、谢瑞、李孝光以及进士马祖常、黄潛、宋褰、张起岩等人或为同僚,或为师友;而元代中晚叶的危素、周伯琦、杨维禎、萨都刺、陈旅、傅若金、余阙、赵汴等人则多为他们的学生或门人。甚至宗教界如吴全节、朱思本、薛玄卿、释大訢、张雨等也与奎章阁文人关系密切。而聚合着南北多民族士子,且有着同僚、同学、朋友、同年背景的奎章阁文人之所以能够集结成群,并且在元代中叶产生持续的集团效应,同题集咏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奎章阁文人驰骋的时代,诸如元仁宗、元文宗以及鲁国大长公主等统治者对同题集咏的热情与鼓励,为奎章阁文人们形成群体、消除南北隔阂创造了相当良好的条件与氛围。由于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创作上的积极推动,同题集咏现象在元代中、晚叶相当繁荣,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元代诗文创作的繁荣,而且消除了馆阁文人间的南北文化隔阂,打通了馆阁与山林之间的消息。诚如杨镰所指出的那样,元代“社会人群(相识也罢,不相识也罢,甚至毫无干涉、南北隔绝)同赋咏一个题目,而纳入一个共同的文化圈”^①,真正大一统的元代文学创作也由此拉开恢弘的序幕。

关于元代正统诗文的探讨,可选择进入的途径很多。就目前元代正统诗文的研究现状来看,又主要体现为从个体研究、群体研究、诗文理论的纵深研究、特色题材研究、交叉综合研究、诗文史研究等,这些研究的细化深入,为目前的元代诗文研究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前景。本书选择从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艺复古理论及创作实践开始研究其诗文创作的特征,是有一定原因的。元王朝在平定江南之后,结束了长达两百年的分裂、割据情形,实现了多民族共存、南北一统的新王朝。就统一的新王朝而言,不仅需要立纲陈纪,恢复法度,而且需要有新的理念与意识来否定失败的旧王朝的各种弊

^①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4页。

端,文艺创作界也不能例外。而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中,几乎所有的新变历程都是以复古为端起的。梳理元代复古思潮的兴起、发展,可以看到元王朝整个朝代从国家政治哲学到文艺思潮都崇尚复古,奎章阁文人群体在时代复古氛围中,扮演的是中流砥柱和推波助澜的角色。欲深入探究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以及元代中叶奎章阁文人群体主持的文坛,必须从他们与元代复古思潮的关系开始。

元王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统领的王朝,为何会在统治哲学上趋于复古?元王朝是由亲近中原儒士的忽必烈一手创建的,当忽必烈在得到刘秉忠、姚枢、许衡、郭守敬、窦默等一班金莲川潜邸儒士的辅佐,平定南宋,将“草原上漫游的牧民们抱有的朦胧梦想”变成现实,成为“文明程度高、农业发达、人口稠密的中国的主人”之后,忽必烈也“希望延续中国王朝的传统”^①。于是,忽必烈王朝承袭中原历朝历代所积累起来的统治经验,“以夏变夷,立经陈纪”^②,“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③,“仪文制度,遵用汉法”^④,并最终确立“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⑤的汉法推行政策,这很大程度决定了忽必烈王朝在政治统治哲学上的复古倾向。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评价忽必烈的政治智慧说:“忽必烈推行了一种二元政策:一方面,他是蒙古至高无上的大汗,继承了成吉思汗、蒙哥的绝对权威,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每个汗都必须服从他的任命,谨守各自的封地——这些汗国都只是元朝帝国的一个行政省;另一方面,他的一生都在戎马倥偬中度过,而且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第十九个忠实延续者,他不折不扣、尽职尽责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保留了宋朝的全部行政机构和官员,并通过努力得到了官员们的效忠。他不仅征服了这片土地,他还征服了这个文明种族的头脑,治愈了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创

①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② 《元史》卷一七“世祖一四”,《元史》第2册,第377页。

③ 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制官”,纪昀等:《四库全书》第1367册,文渊阁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4页。

④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元史》第10册,第3073页。

⑤ 郝经:《立政议》,《全元文》第4册,第88页。

伤。”^①这的确是非常精彩的真知灼见。对于中原汉族的士绅、民众而言,忽必烈复古的政治统治哲学以及尊重封建统治传统的做法,使汉族知识分子的文明尊严得到了维护,也恢复和刺激了他们为大元王朝效力的信心。作为大元帝国的开创者,忽必烈为元王朝之帝国大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子孙始终在执政思想上力求“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②,因此,忽必烈的政治复古哲学在整个元王朝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政治统治哲学会极大地决定官方意识形态。由于儒士们对程朱理学的推重,也由于程朱理学本身那套有益于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理论非常符合忽必烈的统治逻辑,程朱理学在元王朝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读圣贤经典著作,习古以明今,所以,元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指向复古。元仁宗时期才开设的元朝科举考试,考试题目从“四书”中来,所考内容采用朱熹章句集注,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程朱理学由官学而成为“天下之学”^③。

从本质上说,哲学思想领域的复古必然引发文化、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复古潮流的兴起。对于新建的元王朝来说,它的组成除了蒙古各部、一路征服的西域诸族外,还有文明程度颇高的西夏国、辽国、金朝以及最后平定、文明程度最高的南宋,要创造一个新王朝的文明,各民族之间就只有相互调适,各自对自身旧有的文化进行调整。所以,托古改制,由复古道路而走向创新之途,是整个大元王朝文化界的共识。而让元王朝文化创作领域掀起复古思潮的伟大天才人物赵孟頫也应时、应景、应世地出现了。赵孟頫是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32岁时被程钜夫招募至京的,彼时他对南方文化的精熟程度已无与伦比,而北方文化的气象又适时地对他全面展开。在近四十年的任职生涯中,赵孟頫顺应新朝的思潮背景,眼界兼通南北,在文艺创作上的总体复古倾向是由宗唐而追慕上古时代,在具体范式和创作中,赵孟頫提出以晋、唐甚至汉、魏为法,力图以此来去除南宋创作上机巧纤靡

①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175页。

②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元史》第8册,第2484页。

③ 虞集:《(建阳县)考亭书院重建朱文公祠堂记》,王颉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8页。

之弱症,革新北宋与金朝粗犷豪率之气质。由于赵孟頫的勤奋、天才以及非同寻常的努力,终于形成符合大一统时代审美风尚的清腴华润、大气流畅的创作风格。赵孟頫一生所仕的五位元朝皇帝都给予了赵孟頫相当的尊重与肯定,这使得赵孟頫所掀起的文艺复古思潮及所引领的创作风气和审美倾向有着所向披靡的影响力。

赵孟頫没有与奎章阁时代相遇,于至治三年(1323)去世。但奎章阁文人群体中的核心成员包括元文宗、柯九思、虞集、康里巎巎、揭傒斯、欧阳玄、李洞以及杨载、黄潜、柳贯、范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倘若没有奎章阁文人群体对赵孟頫文艺思想理论的继承与发扬,赵孟頫在整个元朝的影响力就没有那么巨大。基于元王朝政治哲学、意识系统、文艺思潮以及赵孟頫的巨大影响,讨论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就不能绕开元代的文艺复古思潮、不能绕开赵孟頫。研究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创作,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着手,围绕着赵孟頫展开,是本书在选题方向以及研究视角上区别于以往研究的重要特点。

本书在研究侧重点上还有一个与以往元代诗文研究相区别的特征,那就是关注元代文坛的多民族共存现实,将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问题作为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同样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当然,元王朝的复古倾向与南北融合趋势其实是相互交织的两个特征。游牧民族成为中原最高统治者,是元王朝的一个典型特征,与此特征相符的另一大王朝特征是,多民族共存,且按族群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元代,由多民族社会特征而滋生出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问题,在时人的认知与表达中又综合地体现为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既有实质上的地理气候分南北的现实问题,更存在臣服先后、文化高下的南北理念认知问题。在元代之前,尽管有过前秦、北魏等以游牧民族统领中原的历史,也有过大唐盛时对中亚游牧民族的绝对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多民族交流融合的情形,但前秦、北魏以及唐以后的辽、金所统领的地区多只止步于北方,远未形成南北一统的局面;而以开放的唐王朝而言,由于中原农耕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游牧民族文化只是作为中原人们具有浓厚兴趣的异域文明而存在,远未达到与中原文明相抗衡的地步。只有在元代,南北一统的局面下,一方面忽必烈所代表的北方统治力

量希望汲取中原定居民族统治管理的经验,以主人翁姿态向农耕文化以及南方文明学习;另一方面中原、南方作为被征服的地域,在蒙元统治者的示好意思下,也竭力期望达成夷夏转型,因此,元代南北融合问题实际混融于元代复古思潮之中,共同发力,但又表征相异。以馆阁高层文人为核心的奎章阁文人群,由多民族成员构成,理所当然的具有多民族特征,如果要探究这个多民族混融的群体在元代中叶文化以及文学创作上的特征与贡献,南北融合问题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内容。基于这一认识,本书将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问题作为奎章阁文人群体诗文创作研究非常重要的内容,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来加以讨论,这种研究侧重点上的不同也是本书区别于以往馆阁文人群体研究的重要方面。

大元王朝的南北问题在平定江南的起初十余年被北方大都朝廷刻意淡化,直到江西文人程钜夫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南访贤后,江南文人大举北进,南北融合问题才变得明显起来。严格意义上来说,程钜夫生于淳祐九年(1249),死于延祐五年(1318),比起基本上出生于元王朝大一统前后的奎章阁核心文人群体,程钜夫应该属于奎章阁文人群体活跃之前的那个时代。但是,对于整个元王朝来说,如果没有程钜夫的努力,他们就不算真正拥有南方;对于元代的馆阁建设而言,如果没有程钜夫的努力,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不会有赵孟頫、袁桷、揭傒斯等一批南方精英的北进,当然也就不会有南方文人逐渐统领文坛的奎章阁文人时代,甚至也无所谓元代文坛的南北融合问题;《元史》将程钜夫列为“木华黎以下二十二人”的元代名臣之一,^①这个评价从程钜夫在元王朝的实际贡献来看,非常合适,而对奎章阁文人群体的研究而言,对于元代的南北融合问题,程钜夫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对象。

程钜夫之后,南人北进、北人南下的情形在整个社会显得普遍而频繁。在国家日益安定、力图文治的过程中,南方农耕文明的精致特征和优越性彰显无遗,而北人在迁徙、游学甚或定居南方的过程中,被南方精致的文化、生

^① 按:此话在中华书局本《元史》中未见,《程钜夫集》校点底本中有,参见张文澍校点:《程钜夫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页。

活方式所打动,那些熟悉流浪、鞍马、放牧生活的北人,像长期定居的人们一样建庐修室,取名用字,有的甚至深受浸染,“感励奋发,以读书稽古为事”^①,并将南方文化反映在自己的行为方式、思想意识与文艺创作中,呈现出引人注目的“北人作南风”情形。创建奎章阁学士院的元文宗从小就对精致的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流放南方之后,更与南方文化水乳交融,在他留下的两篇中文作品中,浸润着相当浓厚的南方文化情结。元文宗最喜欢的画家柯九思,是南方优秀的文人书画家和鉴赏家。柯九思以画竹闻名,也是借画竹之艺赢得元文宗的青睐。在南方文化弥漫的元代中叶,绘画界以画竹石风气颇盛,而且以“其得竹之理趣而不拘于形似者”^②的文人竹画备受推崇,柯九思的墨竹“逸而不逸,神而不神”^③,其画法的妙处在于能以书法之法画竹,“躅继古作,其视文(文同)、苏(苏轼),駸駸乎,可谓升其堂而入其室者”^④,代表了元代中叶,赵孟頫之后文人画的最高水平。而文人画这种浸润着农耕文明的雅致与趣味的创作风气由于元文宗对柯九思的推重在南、北文人间盛行,这不仅意味着游牧文明对于农耕文明优越性与优雅特征的尊服,而且也实际推动了奎章阁时代“北人作南风”情形的热兴。就文学创作而言,元文宗最欣赏的作家是北方回回马祖常。马祖常在江南长三角地区生活二十余年,深受南方文化的滋养与浸润,是奎章阁时代“北人作南风”现象的典型代表。至顺二年(1331),马祖常扈从元文宗到上都,并在元文宗的要求下创作《龙虎台应制》诗。除了对仗工整、气势浩大外,这首诗最精彩、也最搔到元文宗痒处的地方在于它用典精致贴切,尤其是颈联“周穆故惭黄竹赋,汉高空奏大风歌”,将南方文化善于通过典故、史事来指喻现实的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周朝是儒家最认可的上古朝代,周穆王在周朝前代君王积累的基础上,东征西讨,实现周王朝对天下诸侯蛮夷制度上的大一统。周穆王的政绩正应了元文宗修成政书《经世大典》,欲大兴法制

①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卷首,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第1729页。

② 孙岳颂:《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五“元柯九思画竹谱”,《四库全书》第822册,第633页。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721页。

④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八五,《四库全书》第822册,第633页。

以使国家趋于治的理想,非常贴合正踌躇满志的元文宗的心境。由于比附恰当,手法含蓄蕴藉,所以元文宗看过诗歌之后直称马祖常说“孰谓中原无硕儒乎”^①。元文宗对马祖常这样善用南风的北方作家的爱重,对南方文人柯九思以及虞集、揭傒斯等人的偏宠深深刺激了奎章阁时代南、北文人作兴南风的热情,也推动着文坛的南北融合。本书认为“北人作南风”现象不仅是元代中叶文坛南北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给予讨论;而且也在理念上期望给予多民族社会,文化渗透的细化和量化分析,力图改变以往元代诗文研究对于此类问题意象式点染或程式化描述的风格。

与“北人作南风”相对应的是“南人作北风”现象,它是指南人为北方气度、景象、人物风俗、异域宗教等所吸引和折服,在创作中鲜明地展示了游牧文化或典型的北方风物特征的创作现象。在以往元代文学、文化的研究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侧重于游牧民族被汉化的部分,而忽略中原汉文化对于北方游牧文化的内化情形。事实上,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南人处于最低等的元王朝,南人对于北方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学习热情并不亚于北人对汉文化的学习热情。与之相应的是,南人在创作中对北方游牧文化的真切描写,因此比较游牧文化对中原文人影响程度的深浅是元代文学乃至整个传统文学史研究中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比如苏轼有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作对出猎的情形有所描写,但完全是一个深受农耕文明影响的士大夫的视角,由词作的描写会感到作者对于狩猎本身或者说是外行,或者说是完全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只是此种心境而已,而不是狩猎本身。而游牧民族统治下长大的奎章阁代表文人虞集的诗作《金人出塞图》,则从观图题诗的角度对游牧民族出塞围猎的情形作详尽的描述。与农耕文化影响下的苏轼词作那种文人意象化的打猎场景勾勒不同,虞集的题画诗无论是猎场的环境、打猎的布局和步骤还是猎人的服饰、言行以及打猎之后的狂欢场景,都有非常写实、内行的描摹,清晰地呈现出他对于游牧文化的熟稔。作为馆阁重臣和文坛领袖,虞集如此认真地描写一幅出塞打猎图,既代表了那个时代

^① 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懿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4页。

诗歌创作的写实精神,也反映出元代文人对游牧文化的深入了解。尤其不一样的是,在苏轼的辞章中,非常有意地表达了他对西北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的战斗心态,而在虞集的诗作中,这种敌对仇视的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和的心态与饶有兴致的欣赏和融入。由北宋的苏轼与元代中叶的虞集对游牧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狩猎事件的理解与表达,可以看出北方游牧文化对他们以及他们所属时代影响的性质和程度。

在奎章阁文人时代,“南人作北风”现象的创作典型是对元代上都的描写。上都是大都的陪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重要地带,也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忽必烈入主中原,为控制中原全境而迁都燕京,并将燕京改名为大都后,大都成为正都,上都成为陪都。相对于其他朝代的陪都,上都作为蒙古汗廷所在地,形势尤重于大都,是忽必烈“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的重要枢纽,^①对忽必烈联络和控制势力强大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至关重要^②。而且,对于不善于度夏且习惯游牧的蒙古统治者而言,上都还是他们消暑、狩猎、狂欢的重地,从忽必烈中统三年(1264)实行两都巡幸制开始一直到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烧毁上都宫殿为止,每年蒙古皇帝都要带着“后宫诸阍、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③在上都度过至少四个月时间,长者甚至达到七个月时间。由于皇帝在上都待的时间偏长,百司庶府也都在上都设有分院,大量文臣也必须扈从前往上都。以馆阁文臣为代表的奎章阁文人群体大都有到上都分署任职的经历,再加上文治鼎盛时期文宗皇帝对文臣创作的鼓励与奖掖,以上都为表达对象的创作尤其是上京纪行诗成为奎章阁时代文人们吟咏、唱和的重要主题,而其中创作的绝对主力是南方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都完全保持蒙古旧俗,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和象征,上京纪行诗亦由此成为奎章阁时代“南人作北风”的典型创作题材。王恽认为蒙古游牧有三大特征“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飧,三者而已”^④，“征伐”自不必云,而狩猎与宴飧是自忽必烈起,蒙古统治者们往

① 参见虞集:《贺忠贞公墓志铭》,《全元文》第27册,第510页。

② 肖瑞玲:《元上都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

③ 王祿:《上京大宴诗序》,《全元文》第55册,第293页。

④ 王恽:《大元故关西军储大使吕公神道碑铭》,《全元文》第6册,第497页。

来于上都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还是由于游牧民族的特征,从忽必烈时代的巡幸上都活动开始,大肆宴飨、赏赐以联结诸王藩戚就是巡幸上都最核心的内容。宴会主要有马奶子宴和诈马宴,马奶子宴基本在皇帝到达和离开上都时举行;“诈马筵”,又称“质孙(济逊)宴”,源于窝阔台时期的选汗大会,本是装饰名马的夸马表演。^① 阅读元代诗人尤其是奎章阁文人们的诗文集,味道甘醇特别的马奶以及充满游牧文化色彩的诈马宴的出现频率相当高。只有充分注意到上京纪行诗所独有的魅力与特征,才有可能将元代诗歌作为真正独具特色的存在与唐宋、明清的诗歌并论问题,因为这是元代诗歌最具特色的所在。

关注元代诗文尤其活跃于元代中叶、国家太平时期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创作情形,不能忽略那个时代的社会情绪。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元王朝“西至乎玉关,东至于辽水,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无论秦、汉还是隋、唐,元王朝,与之前的所有一统王朝相比,元王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②,尽管这种舆地广袤的背后是杀戮、掠夺,但太平时生长其中的帝王以及民众却由此生出睥睨今古、傲视前朝的时代自信感:

涿江成血,唐不能师,今我吏之;辽阳高丽,银城如铁,宋不能窥,今我臣之。回鹘河西,汉立铜柱,马无南蹄,今我置府;交占云黎,秦筑长城,土止北陲,今我故境。阴山仇池,缺舌螺发,鰲面雕题,献獒效马,贡象进犀,络绎乎国门之道,不出户而八蛮九夷。^③

疆域的辽阔、民俗风貌的多元、地理气候的迥异以及物产的丰富奇特使得元代诗文在复古思潮影响下,对上古所推崇的诗“可以观”、“可以群”的特点深有体会。而且作为游牧民族统领的多民族国度,作为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大国家的子民,农耕时代的变动不居的特点被最大限度地颠覆了,可以引发人们描述、赋咏的事物和事件非常多,也非常具有独特性,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只有详尽叙事、铺张纪实才能略略彰显自己居处于不断变化的世界里所带来的深切惊奇感和不断见识新事物的诧异自豪感。正因这样

① 参见李军:《“诈马”考》,《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② 戴良:《皇元风雅序》,《全元文》第53册,第292页。

③ 黄文仲:《大都赋》,《全元文》第46册,第136页。